

转型经济中的放松管制和企业重构的最优路径

陈 钊*

摘要 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中国转型中的最优转型路径(或速度)是如何被决定,又是怎样地影响国有企业的重构以及所有制结构的调整的。这正是 Roland(2000)所强调的转型经济学中的“大规模部门再配置的动态分析”,然而,与现有文献不同的是,本文中这种部门再配置并非建立在产权改革的基础之上,而是政府放松对国有企业的管制(如就业管制)的结果,本文通过一个动态模型研究了在这一机制下的最优转型速度、企业重构及所有制结构的调整。

关键词 转型路径,企业重构,所有制结构调整

一、引言

本文将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的最优转型路径(或转型速度)是如何被决定的,又是怎样影响国有企业的重构以及所有制结构的调整的。Roland(2000)特别强调了转型经济学中“转型的政治经济学”、“大规模部门再配置的动态分析”和“企业治理结构变化”这三部分内容,认为它们“与转型密切相关但同时也包含对经济学来说更一般的信息”,本文的研究恰恰属于其中的第二部分,旨在分析中国转型过程中国有部门劳动力资源再配置的动态变化以及与之相关的企业重构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

在经济转型问题上,早期国外一些主流经济学家提倡所谓的“大爆炸式”(big bang)的或激进的¹改革方式,主张对计划经济国家采取迅速的和完全的私有化(Lipton and Sachs, 1990; Fischer and Gelb, 1991; Newbery, 1991; Woo, 1994等)。然而,随着激进式改革在俄罗斯、东欧等国导致的产出的严重下滑以及中国的渐进式改革的极大成功,理论界对于激进改革的批评也逐渐增多²,甚至是原先激进改革的推崇者都认识到了过快改革的潜在风险

*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通讯地址:上海市邯郸路220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200433,电话:(021)68717646, E-mail: zhaochen@fudan.edu.cn。感谢法国国际经济发展研究中心(CERDI)主办的第三届中国经济国际研讨会的与会者许心鹏和 F. Lemoine 等人,以及由澳大利亚中国经济研究会和福特基金会等联合主办的中国经济增长国际研讨会与会者的批评与建议。感谢复旦大学经济学系的张军、陆铭、《经济学(季刊)》匿名审稿人等对本文的有益评论与建议。当然,文责作者自负。本文研究得到了200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2CJL001)的资助,特此感谢。

¹ 本文所称的激进改革方式即指俄罗斯、东欧国家的“大爆炸式”的改革方式。对改革方式的各种分类的详尽讨论可参见张军(1997,第93—99页)。

² “大爆炸式”的改革理论被认为受到建构理性主义的影响,对经济转型中制度变迁所需要的时间和可能导致的社会成本都估计不足。相关的评论可参见张军(1997)。

(Aghion, 1993), 与此同时, 各种支持或解释中国式改革的理论纷纷涌现(如 McMillan and Naughton, 1992; Dewatripont and Roland, 1992a; 1992b; Aghion and Blanchard, 1994; 林毅夫、蔡昉、李周, 1994; 哈勒根、张军, 1996等)。

虽然激进式改革在实践中几乎以失败而告终, 但理论上的争论仍在多个方面继续进行, 其中一个重要的话题是对产权改革的评价。事实上, “大爆炸式”的改革方式恰恰反映了“产权教条”在经济学中的根深蒂固, 俄罗斯、东欧的激进改革几乎都按照主流经济学家所开的“药方”以大规模的私有化为前奏。因此, 在激进改革受到质疑的同时, 人们很自然地就对产权改革的作用产生了怀疑, 例如, Aghion 等人认为企业改革的研究重点应当是重构(restructuring)³而非私有化, 东欧经济转型国家的实践表明那种认为私有化是重构充分且必要条件的观点值得怀疑(Aghion, Blanchard and Carlin, 1994)。

回顾近期的转型经济学文献不难发现, 转型国家的企业重构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重构的经验研究方面, 对于私有化对重构的作用究竟怎样、私有化从哪些方面促使重构的发生等问题的回答似乎还需要转型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提供更多的研究素材。⁴ 在理论研究方面, 企业重构中伴随的部门再配置过程被认为存在着各种可能的“摩擦”(如来自于劳动力市场的“摩擦”), 因而资源的调整就不可能瞬时完成, 于是动态分析的方法被越来越多的研究所采用, 这也使得这些对重构的动态分析中同时包含着对转型(或重构)的最优路径的研究。例如, 在 Burda (1993) 对就业重构的动态分析中, 最优转型路径表现为转型之初国有部门的迅速收缩以及随之而来的失业率的骤然上升。然而, 更多的研究认为转型应当是渐进的, 例如 Castnheira 和 Roland (2000) 指出在转型初期过快的重构速度会通过降低内生的储蓄水平而最终拖累经济的转型, 降低部门再配置的速度, 类似的结论还可见于 Aghion and Blanchard (1994)、Chadha and Corcelli (1997) 等。

上述这种部门间资源再配置的最优速度或重构的最优路径很可能因转型

³ 类似的说法还有重组或结构重组, 虽然重构一词在近期的转型研究中被广泛使用, 但似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比较严格的定义, 在此可以列举一些比较典型的提法。Aghion 等人将重构视为国有企业成为与私有企业相同的市场主体所需进行的变革。这些变革包括企业内部组织的变迁、不良资产与非生产性资产的剥离、冗员解雇与企业员工激励机制改革、设备现代化更新等(Aghion, Blanchard and Carlin, 1994)。Sacco 和 Scarpa (2000) 认为对重构的含义的精确界定取决于特定的讨论环境, 在他们的论文里, 重构被视作为增加了生产投入而削减工资总额的行为。Dyck (1997) 在其研究中将重构定义为企业在内部组织、劳动力政策、产品市场策略以及财务控制等方面的变革。在更多的研究中, 企业的重构被聚焦于国有企业冗员的排放, 如 Aghion and Blanchard (1994), Burda (1993), Katz and Owen (1993) 以及 Shleifer and Vishny (1994)。

⁴ 部分经验研究认为产权改革能够促进国有企业的重构(如 Belka *et al.*, 1995; Barberis *et al.*, 1996; Falchetti *et al.*, 2000), 但也有的研究发现几乎没有证据显示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后更可能发生重构(Carlin *et al.*, 1995; Estrin *et al.*, 1995)。

国家的不同而不同。例如，前述对重构的研究都是以俄罗斯、东欧国家的产权改革为背景的，然而中国在转型中的企业重构方面的独特经验却能够帮助我们从产权改革之外，即政府放松管制的角度来理解经济转型的路径和速度。与俄罗斯、东欧等国不同，中国的经济转型是在产权改革严重滞后的情况下发生的⁵，与此同时伴随改革初期对小私有部门发展的鼓励政策，非国有部门的进入与成长却十分显著，成为产出增长的重要动力。不无巧合的是，这种增量上非国有企业进入的转型方式在对俄罗斯与东欧国家的研究中被认为是低成本的、最有利于经济重构的（Murrell, 1992；Haddad, 1995；Green, 1993）。此外，现有的对于转型路径的研究无不将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作为模型的基本假定而给出，并将其成因归结为所有制本身。这就完全忽视了加在国有企业身上的各项社会负担（如沉重的退休金、医疗费用开支、冗员安置）对企业效率的不利影响（Lin *et al.*, 1999），也完全排除了存在产权改革之外的使转型中国有企业效率提高的可能。显然，我们需要从动态最优的角度出发，寻找与中国改革的微观基础相一致的“最优转型路径”，并进一步回答在最优转型路径下，中国国有企业的重构是如何发生的？企业重构对于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具有怎样的含义？是否存在一个内生确定的所有制结构的均衡解？对这些理论问题的回答能够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放松管制因素在企业重构和所有制结构调整中的作用。

哈勒根和张军（1996）曾较早地从产业组织的视角，通过构造一个关于价格双轨制的“主导部门——边界竞争”的模型来考察改革起点、计划产出随时间的削减速度和国有部门受补贴程度等因素对转型经济产出总量与结构（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的产出份额）的影响。但是，他们的模型并没有注意到国有企业特有的劳动力冗员的动态变化对转型路径的影响。樊纲（2000）将经济的所有制结构的转变建立在非国有经济的增长率高于国有经济的增长率这一“基本假定”之下，并认为为了支撑经济的增长和为国有经济的改革创造有利条件，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成为体制转轨的首要问题。但我们的疑问是，既然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为国有经济的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那么在经济转型的动态过程中，上述“基本假定”是否始终不变，并如樊纲所判断的那样国有部门必然在整个经济中趋于一个比较小的“均衡值”，甚至为零呢？或者说，这种“基本假定”是国有企业产权性质的必然结果还是计划体制的历史遗留问题造成的？在后一种判断之下，迄今为止中国经济转型中的所有制结构变化是否能够得以很好的解释呢？平新乔（2000）对此作了尝试，他认为国有经济比重的下降是由于国有企业的目标从纯粹的社会福利最大化向部

⁵ 1999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总产值份额仍然占28.21%，2001年由于产值统计中剔除了的产品销售收入不足500万元的非国有工业企业，这一比重上升到44.43%（据《中国统计年鉴2000》和《中国统计年鉴2002》）。

分地追求利润最大化转移之后引发非国有企业的进入而导致的,最终国有经济的比重将趋于一个大于零的均衡值。这样就内生地对所有制结构的转变进行了分析。但平新乔将国有企业的目标转变归因于政府对企业的“放权让利”,这样就只是从模型之外寻找原因,没有从模型本身出发内在一致地解释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应当在什么时候发生变化?之所以如此,笔者认为这是由于其模型完全忽视了国有企业的财务表现对政府与企业的影响。⁶ 在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的同时,国有企业的正常经营是否能够维持,如果不能,政府应当怎样对国有企业进行补贴,这些都是该模型所没有涉及的。另一项与本文相关的研究是田国强(2001)对转型经济的最优所有权安排的分析,他的研究所强调的是不同经济制度环境将会导致怎样的不同的最优所有权的安排,属于比较静态的分析,而本文研究则侧重于讨论在政府的既定动态最优目标之下,转型过程中经济的所有制结构是如何内生地发生变化的。

本文认为,中国转型中国有企业的重构首先是政府对企业的就业管制放松的结果,在此基础上我们将证明,如果确实存在最优的转型路径,那么只要考虑到失业可能造成的社会成本,转型或企业的重构从冗员排放的角度而言就应当是渐进式的。我们还将证明,当政府同时以产出与就业为目标时,即使不考虑所有制本身对企业效率的影响,最优转型路径下所有制结构调整的动态过程也会符合我们对现实的观察,同时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及其均衡又是由模型内生决定的。本文的模型也能够解释中国转型中国有企业产出效率的提高以及特有的低显性失业率现象,并且说明了转型中国有与非国有部门之间不只是相互竞争的关系,恰恰是非国有部门的发展为国有部门的重构创造了条件,这与樊纲(2000)的分析是一致的。

本文余下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归纳了与本文模型密切相关的中国经济转型中的一些特征性事实。第三部分给出了一个政府控制下的最优转型路径的动态模型,对模型解的讨论以及转型路径与所有制结构调整的数值模拟分别在第四、五两部分给出。最后是本文结论与模型的可行性扩展。

二、中国经济转型中的一些特征性事实

随着不完全合同理论的出现,公有制与私有制的效率差异在理论上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承认,在中国,国有企业的低效率也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⁷,但是,我们还想指出的是,现有的最优转型路径研究几乎完全忽略了政

⁶ 或者说,该模型并没有突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包括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国有企业的效率确实要落后于非国有企业这一事实。

⁷ 例如,张维迎(1994)曾用特殊的委托代理关系来解释国有企业的低效率。

府加在国有企业身上的各项社会负担（如沉重的退休金、医疗费用开支、冗员安置等）对企业效率的不利影响，其中尤为突出且至今仍得不到彻底解决的就是国有企业安置冗员的社会负担。⁸事实上，中国国有企业内大量冗员的存在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在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绝大部分的劳动人口被安排到国有企业内工作，改革后，国有企业也被政府当做解决社会就业安置的一大工具，相比之下，新生的非国有企业在就业方面受政府的干预要少得多。⁹国有企业隐性失业的长期大规模存在对国有企业经营效益与效率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明显的，为隐性失业人员支付各项费用使国有企业生产成本上升，隐性失业的存在也使国有企业内部劳动力效率低下。¹⁰

正是由于国有企业的低效率与各项社会负担密不可分，国有企业也获得了相应的补偿。国有企业得到来自政府的持续补贴，并且在金融市场上，国有企业享有各种优先权。更多的贷款给了国有企业而不是非国有企业。¹¹据人民银行调查统计，约有70%的贷款投放给了国有企业，而非国有企业只能得到十分有限的贷款，1999年，银行借给个体户和私营企业的贷款仅占全部短期贷款的1%，这与私营经济占GDP比例高达13%的情况完全不成比例。¹²联系到连续几年的大幅度降息以及近年来金融领域逐渐浮现出不良贷款甚至坏账比重偏高事实，不难发现银行对国有企业的贷款优先已经成为转型期间国有企业预算约束软化的一个重要成因。¹³此外，国有企业在股票上市融资方面也享有优先权，一些地方将上市指标当作了企业解困的政策资源加以利用。¹⁴即便在非国有企业被允许进入中国内地股市的今天，大量绩优企业仍然需要排队等候，部分民营企业为了获得上市融资的权利，不惜高价买“壳”上市，甚至于为此而背上沉重的包袱。

金融市场上的融资优先在软化国有企业预算约束的同时，使非国有企业获得资金的成本相对提高。也就是说，通过金融市场，政府实际上向非国有

⁸ 据国际劳工组织和中国劳动部在1995年联合进行的一次“企业富余劳动力调查”显示，城镇各类企业的综合隐性失业率为18.8%，接近于国家其他权威部门对城镇就业中隐性失业率作过的估算（国家计委和体改委提出为25%，国家研究机关提出为20%—25%，统计局为20%，劳动部为10%—12%）。参见王诚（1996）。

⁹ 当然，非国有企业也可能由于政府干预以外的其他原因而存在隐性失业，但这种隐性失业有可能是自愿的，如劳动力市场的调整成本所导致的隐性失业等，关于中国的隐性失业的讨论可参见袁志刚、陆铭（1998）。

¹⁰ 根据董晓媛和Puttermarf（2002）的实证分析，中国国有企业劳动力冗员的增长与企业TFP和单位生产性资本资产的利润下降的趋势相一致。

¹¹ 由统计数据可知，每当宏观经济出现紧缩迹象时，国有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总是回落较慢，在这些年份内反而超过了非国有经济。对此，一个很容易让人想到的解释是宏观紧缩时，非国有企业首先受到了银行的贷款限制。

¹² 转引自李薰（2000）。

¹³ 相关分析可参见张春霖（1997），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1999）。

¹⁴ 从2001年3月开始，在股票发行中由核准制逐渐取代额度制，企业上市不再分配指标。

企业征收了隐性税收,同时又向国有企业进行了隐性补贴。¹⁵

特殊的社会使命使改革后的国有企业并没有在短时间内被大规模地私有化,而预算约束的软化则为国有企业的继续生存提供了可能。虽然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国有企业就开始实施了一系列旨在改善激励机制、提高企业效率的改革措施,但是直到90年代后对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力度才有所加强。与此同时,中国的非国有企业规模在转型过程中基本上保持着增长,由于产权改革的滞后,非国有经济比重的增加主要不是存量国有企业在产权改革中所有制性质转换的结果,而是非国有企业的进入与扩张所造成的。

三、动态模型

上述事实向我们展示的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转型方式。在中国的经济转型中,政府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对国有企业的冗员排放加以控制,并且以贷款优先等方式对国有企业进行补偿,使得非国有企业也间接地承担了一部分隐性失业所导致的成本。

政府控制下的国有企业冗员的排放直接决定了转型中国有企业重构的速度,因此,中国转型中的企业重构与俄罗斯、东欧等国的以私有化驱动的企业重构(裁员)具有完全不同的微观机制。这也决定了中国的经济转型不是产权改革主导的。我们通过如下的动态模型来考察中国转型(或企业重构)的最优路径。

(一)基本假定

假定经济由国有与非国有两大部门组成,各自的就业量分别为 S 与 N ,¹⁶并且都具有资本劳动比为1的里昂惕夫式的生产技术。考虑到转型经济中企业内部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替代是有限的,对生产函数的这种假定也是合理的,并且使得分析上易于处理。¹⁷由于在中国的转型期间资本总是短缺的,因而多余的劳动力就可能成为企业内的隐性失业人员。由于政府更容易控制国有企业的就业数量,因此我们还假定在二元就业体制之下非国有部门的就业全部属于有效率就业,而国有部门除了有效率就业(S_E)之外还吸纳了一定的隐性失业(S_D)。¹⁸与Aghion and Blanchard(1994)以及Castanheira and

¹⁵ 樊纲(2000)曾论及这种政府向国有企业的资源转移。钱颖一(1995:第143页)也将国有银行对亏损企业的政策性贷款视为一种隐性的财政补贴。

¹⁶ 更为完整的表示应该为 $S(t)$ 和 $N(t)$,出于简便我们将 t 都略去,下同。

¹⁷ Castanheira and Roland(2000)在转型的最优速度分析中也使用了同样的假设。

¹⁸ Shleifer and Vishny(1994)从政客与企业的合作博弈的角度对国有企业的隐性失业给出了独特的解释。他们认为,由于企业的国有性质,政客可以动用全部的国有企业利润来购买过剩就业,这正好使国有企业愿意进行合作承担吸纳过剩就业的任务,但如果企业的产权性质不完全为国有,那么政客可以动用的资源(凭借国有产权获得的企业利润的分成)就不足以再让企业维持原来的过剩就业。

Roland(2000)的分析相类似,我们假设所有有效率劳动力都是同质的。用 L_E 表示全部的有效率就业量并且将劳动力人口总量标准化为 1,用 U 表示显性失业率,那么我们有:

$$L_E = S_E + N, \quad (1)$$

$$U = 1 - L_E - S_D. \quad (2)$$

为简便起见我们将产量直接表示为有效率劳动力的数量,这样,全社会的总产出为:

$$Q = L_E. \quad (3)$$

(二) 动态

接下来考察就业的动态。假定在竞争性的市场上产出品价格恒定为 1,利润是总收益的某个固定比例(a),并且企业将全部利润用于投资,但隐性失业的存在对企业利润造成侵蚀。这种不利影响除了直接由国有部门承担一部分之外,还借助隐性税收的形式部分地转嫁给了非国有部门。

在资本短缺的里昂惕夫式生产技术下,两大部门的就业创造就由其净利润水平决定:

$$\dot{S}_E = aS_E - (1 - \tau)bS_D, \quad (4)$$

$$\dot{N} = aN - \tau bS_D. \quad (5)$$

式中 a 、 b 为大于零的系数, b 代表每单位隐性失业的额外成本, τ 是政府向非国有部门征收隐性税收的力度($0 \leq \tau \leq 1$)。也就是说,利润被用于积累以创造出新的就业岗位,但冗员造成的成本影响了企业就业创造的速度,并且这一成本根据 τ 的大小在国有与非国有部门之间进行分摊。综合以上两式,全社会总的就业创造就由现有的有效率劳动力数量和国有部门的隐性失业数量决定,即:

$$\dot{L}_E = aL_E - bS_D. \quad (6)$$

(三) 最优问题

我们假定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国有企业的隐性失业规模(或对隐性失业的排放)由政府控制,在确定国有企业向社会释放(或吸纳)隐性失业人员的具体数量时,社会总产出与显性失业造成的社会成本都在政府的考虑之内。

用 $\frac{1}{2}U^2$ 表示失业带来的社会成本,¹⁹这样,给定初始的有效率就业量 $L_E(0)$,

¹⁹ Burda(1993)也使用了类似的社会损失函数。

政府的跨期最优决策就可以由如下的动态最优规划表示：

$$\max_{S_D} \int_0^{\infty} e^{-rt} \left[L_E - \frac{1}{2}(1 - L_E - S_D)^2 \right] dt. \quad (7)$$

$$\begin{aligned} \text{s. t. } \quad & \dot{L}_E = aL_E - bS_D, \\ & L_E(0) = L_E^{(0)}, \\ & 0 \leq S_D(t) \leq 1 - L_E(t). \end{aligned}$$

四、分 析

在上述动态最优问题中，我们有一个状态变量 L_E 和一个控制变量 S_D ， e^{-rt} 为折现因子。²⁰ 由于存在不等式约束，我们将这个问题的现值汉密尔顿函数写成如下的拉格朗日函数形式：

$$H = L_E - \frac{1}{2}(1 - L_E - S_D)^2 + \lambda(aL_E - bS_D) + \theta(1 - L_E - S_D). \quad (8)$$

在这个最大化问题中，我们有 $\frac{\partial^2 H}{\partial S_D^2} = -1 < 0$ ，因而二阶条件得到满足。

利用库恩—塔克条件，我们可以将此问题的解分为四种情况进行讨论。²¹

第一种情况：两个约束条件都不起作用，即 $S_D > 0$ ， $1 - L_E - S_D > 0$ 。由此可解得 S_D 的动态方程：

$$\dot{S}_D = (r - a)S_D - (2a + b - r)L_E + a + 2b - r. \quad (9)$$

第二种情况：仅约束条件 $S_D \geq 0$ 起作用，即 $S_D = 0$ 。解得：

$$\dot{L}_E = aL_E. \quad (10)$$

此时，每增加一单位隐性失业对政府效用水平的边际贡献始终为负，这样，政府的最优决策是让国有企业将冗员全部释放，利润全部被用于创造新的就业。事实上，这种情况表示企业重构（或经济转型）最终成功结束。

第三种情况：仅约束条件 $1 - L_E - S_D \geq 0$ 起作用，即 $1 - L_E - S_D = 0$ 。解得：

$$\dot{L}_E = (a + b)L_E - b, \quad (11)$$

$$\dot{S}_D = -\dot{L}_E. \quad (12)$$

²⁰ 这里，折现因子的存在足以保证被积函数的收敛性。

²¹ 具体过程参见附录。

此时，社会显性失业率为零，劳动力人口规模成为约束，在我们给定的就业创造机制之下，如果就业创造为正，那么新增的有效率就业全部来自于对国有企业隐性失业的吸纳，如果就业创造为负，那么这部分减少的有效率就业就全部成为国有企业新增的隐性失业。

第四种情况：两个约束条件都有效，于是我们有： $L_E = 1$ ， $S_D = 0$ 。

这是经济重构成功结束的一种可能结果，此时隐性失业对政府效用的边际贡献也为负，与第二种情况所不同的是，这里在隐性失业释放完毕的同时社会有效率就业量也刚好达到 1。

以上第一种情况的解是在约束条件不起作用的条件得出的，接下来我们首先根据这个解中 L_E 与 S_D 的动态方程画出相图，然后结合其他几种情况分析可能的转型路径。

通过 (6) 式与 (9) 式，我们能够得到曲线 $\dot{L}_E = 0$ 与 $\dot{S}_D = 0$ ：

$$aL_E - bS_D = 0, \quad (\text{曲线 } \dot{L}_E = 0 \text{ 的方程}) \quad (13)$$

$$(r - a)S_D - (2a + b - r)L_E + a + 2b - r = 0.$$

$$(\text{曲线 } \dot{S}_D = 0 \text{ 的方程}) \quad (14)$$

如图 1 所示，曲线 $\dot{L}_E = 0$ 是经过相图原点向右上方倾斜的一条直线，曲线 $\dot{S}_D = 0$ 的位置要视参数 a 、 b 与 r 的大小而定。我们假定 $a > b$ ，²² $a > r$ ，²³而曲线 $\dot{L}_E = 0$ 和曲线 $\dot{S}_D = 0$ 则将相图平面分割为四个区域，我们分别用四组箭头表示这四个不同区域内点的移动方向。于是，我们有两条通往 E 点的稳定分支（图中用朝向 E 点的双箭头线表示），而 E 点则构成动态问题在无约束条件下的鞍点均衡。²⁴

图 1 中的四条流线分别代表了起始于不同区域的初始点的移动轨迹。例如，图中源自 A_1 点的转型路径表示政府为了降低过高的显性失业率而破坏了全社会的就业创造机制，使经济陷入了有效率就业萎缩而隐性失业规模却又不持续扩大的恶性循环之中。²⁵图中源自 A_2 点的转型路径所描述的是当初始的有效率就业规模较大时，政府为降低显性失业率而要求国有企业吸纳更多的隐性失业并不会彻底破坏整个经济的就业创造，因而尽管在前期隐性

²² 假定 $a > b$ 只是出于绘制相图的方便，模型本身对参数 a 、 b 的相对大小并无特别要求。当然，如果 $a < b$ ，那么相图的画法会有所不同，但模型的结论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²³ 如果将 r 视为无风险的报酬率，那么只有当 $a > r$ 时企业的投资才是有意义的，因而这一假设也是合理的。

²⁴ 下文我们会利用模型的约束条件对 E 点作进一步讨论。

²⁵ 在 Aghion and Blanchard (1994) 以及 Chadha and Corcell (1997) 的模型中，一定条件下也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业率为零。²⁷

接下来讨论我们所设定的初始状态与转型路径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图1中的虚线段AD进行划分，我们可以将改革的初始状态作进一步的区分。

1. CD段内部

当改革的初始状态处于虚线段CD内部时，改革之初国有企业的冗员负担最大，同时全社会有效率劳动力（或资本）的存量又是最小的。在CD段上我们有 $\dot{L}_E < 0$ ， $\dot{S}_D > 0$ 。又由于在无约束状态下有 $\dot{S}_D - |\dot{L}_E| = a + 2b - (a + b)(L_E + S_D) = b > 0$ ，即 $\dot{S}_D > |\dot{L}_E|$ 成立，因而由动态方程所驱使的点的移动受到了劳动力人口规模约束的限制，此时转型路径就由前文中第三类解的情况所描述，即 $\dot{S}_D = -\dot{L}_E$ ，或在相图上表现为沿着CD向右下方运动。这样，在经济转型一开始企业就业创造的动力就已经完全丧失，企业有效率就业萎缩，同时政府要求国有企业吸纳更多的隐性失业，这又加速了有效率就业的萎缩，最终使经济转型完全失败。这种情况再现了Aghion and Blanchard(1994)的研究结果。

2. C点

在C点时全社会的就业创造刚好为零，但相图中的流线却是朝着隐性失业规模增加的方向运动的，因而此时人口规模约束起作用，根据动态模型的第三类解我们有 $\dot{S}_D = 0$ 。我们也可以更直观地来理解C点的性质。当劳动力人口规模约束有效而有效率就业量又不变得时，既没有显性失业人员又没有来自于有效率就业萎缩后的过剩劳动力需要国有企业吸纳，因此经济事实上处于一种均衡状态²⁸，尽管这是一个不稳定均衡。

3. BC段内部

当改革初始状态可由虚线段BC内部的点所表示时，与前面的第一种情况相比，改革之初隐性失业的相对数量有所下降。由相图中区域IV的流线方向可知此时劳动力人口规模又成为约束，从而我们有 $\dot{L}_E > 0$ ， $\dot{S}_D = -\dot{L}_E < 0$ ，即经济转型的轨迹是沿着BC往左上方移动进入下面我们所要分析的另一种情况。对BC段经济转型的直观描述是：转型之初隐性失业规模的相对较小使经济得以保持正的就业创造，此时，隐性失业被逐渐吸纳，国有企业开始重构，经济转型步入了一个隐性失业不断减少而就业创造速度持续加快的良性循环。

²⁷ 1986年推行劳动合同制时，中国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为2.0%，而美国的自然失业率大约为5%—6%，这样的比较虽然不太严格，但应当能够使我们相信在理论上假定中国转型初的显性失业率为零是可行的。此外，为简便起见我们忽略了每年新增的劳动力人口，由于相对于总的劳动力人口规模，增量部分只占了一个较小的份额，因而这样的简化并不影响模型的基本结论。

²⁸ 但此时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很可能仍在继续。

4. AB 段

起始于 AB 段的点的移动也受到劳动力人口规模的制约,但其原因与前一种情况不同。AB 段位于相图中区域 I 内,即 $\dot{L}_E > 0$, $\dot{S}_D < 0$,根据(6)式与(9)式不难证明此时 $|\dot{L}_E| > |\dot{S}_D|$,也就是说由于不受约束时就业创造速度快于国有企业隐性失业排放速度,因而 AB 段上点的移动受到了劳动力人口规模的约束,这样实际的隐性失业变化应该是 $\dot{S}_D = -\dot{L}_E$,即全社会劳动力需求的扩张使国有企业能够以更快的速度排放隐性失业。这样,经济转型的路径将是沿着虚线到达 A 点。在 A 点处,国有企业隐性失业完全被就业创造所吸纳,经济转型成功结束。

综合以上四种初始状态下转型路径的特征,我们可以发现,在 AD 上,改革的起点与 A 点越接近,经济的转型就越可能取得成功,由于 AD 上改革的起点与 A 点的距离代表了国有企业初始就业负担的大小,因而我们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 1 转型之初隐性失业对整体经济造成的负担越轻,经济的转型就越可能成功。

我们的动态模型显示了在不以产权改革为基础的经济转型中初始条件对转型的成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就为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现象提供了一个来自于主流经济学的注脚。相反,如果在经济转型之初整体经济由于隐性失业存在所受的负累过大,那么试图依靠社会的就业创造且同时兼顾对显性失业率的控制来实现经济的成功转型是不可行的,此时转型国家必须经历失业率上升的阵痛,否则社会将陷入就业包袱越来越沉重,就业创造机制受到破坏的泥潭。²⁹

上述第 3、4 两种情况描述了通向成功的转型路径的特征,由此我们得出命题二。

命题 2 在通向成功的转型过程中,如果初始状态下的显性失业率为零,那么政府将继续对显性失业率水平进行控制。

此命题是说,如果转型初期政府推行零失业率的充分就业政策,那么在转型中只要条件允许,政府也总是会尽力避免因转型本身引起的失业率上升。这一命题基本符合我们对中国转型事实的观察。随着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追求利润的动机越来越强烈,辞退企业隐性失业人员已经成为大部分企业的愿望,然而国有企业对职工的辞退受到政府的严格限制,即使是从 1986 年推行

²⁹ 我们不妨针对前苏联的转型经历作这样一个猜想,前苏联经济的转型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就以非产权改革主导的形式开始进行了,只是由于初始条件较差,改革难以在控制显性失业率的同时依靠就业创造吸纳隐性失业获得成功,最终政府不得不采取一种伴随较高社会成本的激进的产权改革主导的转型方式。

劳动合同制以后，许多企业也无法充分行使有限的辞退权，隐蔽在国有企业内部的大量失业人员并没有随着经济的转型而被迅速地向社会排放（符钢战，1992）。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部分国有企业开始以企业内下岗的形式逐渐分流一部分隐性失业，到了 1996 年，上海市开始设立并扩大对下岗职工进行托管的“再就业服务中心”，这一形式随后又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规模仍受政府控制（例如每年上海市劳动部门都会制定当年下岗职工规模的总量规划），政府对显性失业率的上升依然较为敏感（陆铭，2003）。³⁰从统计数字上看，虽然自试行劳动合同制的 1986 年以来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有上升的趋势，但到 2001 年也只是达到 3.6% 的水平³¹，如果将规模略大的下岗人员也计入在内，与中国劳动力的富余程度相比，失业还是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的。

从命题 2 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推论：中国转型中登记失业率的上升主要应当由结构性失业等原因来解释³²，这可能是随着劳动力资源再配置的从无到有，传统就业体制下的低失业率向自然失业率回归的过程。

命题 2 的另一个隐含之意是，既然转型中政府始终对显性失业率加以控制，那么国有企业内部隐性失业的排放就只能依靠全社会的就业创造来吸纳，由（6）式可知，这一过程必然是渐进的。因此，从企业排放隐性失业这个角度来说，企业的重构（或转型）是渐进式的。

如果以 $\bar{S}_L(0)$ 表示转型通向成功所能承受的最大的初始隐性失业规模，那么由图 1 可知该隐性失业水平由 C 点位置决定，即：

$$\bar{S}_L(0) = a/(a + b). \quad (15)$$

（15）式表明，当初始隐性失业规模给定时，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在本文模型中由 a 决定）和较少的隐性失业所导致的利润侵蚀（由 b 决定）都将使得经济转型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增大。

以 1986 年作为初始期³³，图 2 还给出了转型中隐性失业规模变化的模拟。

³⁰ 大规模的“下岗”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下岗职工（尤其是效益较好的国有企业的企业内下岗职工）的处境要好于显性失业人员，因此与显性失业相比，下岗所造成的社会成本较小。从这个意义上说，下岗的制度本身也就是政府对显性失业进行控制的结果。当然，也需要承认的是，本文模型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下岗现象的出现以及显性失业率上升的事实，对此我们在文末作了进一步的说明。

³¹ 到目前为止，《中国统计年鉴》上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仍然是我们可以获得的衡量中国显性失业率的惟一指标。2000 年 5 月，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与上海市统计局联合开展了一次城镇失业抽样调查，结果失业率为 7%（按国际通行的失业调查口径，失业定义及抽样细节可参见祝均一、袁志刚，2001 第 46 页），以上海市为例，只要该数据是真实可信的，那么根据现有数据所反映的下岗规模略高于登记失业率这一规律倒推来看的话，统计年鉴上的登记失业率也还是比较可信的。

³² 根据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资料显示，历年来失业群体的平均年龄逐年上升、平均失业周期延长，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失业的结构性特征，即集中于一些技术陈旧的传统行业的大龄低技能劳动力成为长期失业的主要群体。

³³ 本文模型的动态机制是社会就业创造对国有企业隐性失业的吸纳，若不对国有企业进行产权改革，就必须以传统计划就业体制的打破为前提，而 1986 年国务院颁布的《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正是我国就业制度改革的一个转折点。

我们将 $S_{I_f}(0)$ 设定为 0.3，通过对参数 a 、 b 的不同设定，不难发现，隐性失业规模都在加速下降且最终完全被社会的就业创造所吸纳³⁴，并且由于模型参数值的不同，图中隐性失业的变化路径也有差异。当 $a=0.02, b=0.01$ 时，企业的重构从国有企业排放冗员这一意义上而言到 2006 年就能结束。如果 b 值增加为 0.025，那么企业的重构将延缓到 2011 年才能结束。对比第三组取值可以发现， a 值的减小对就业创造的负面影响更大， a 值从 0.02 下降到 0.012，隐性失业的完全吸纳就推迟到了 2022 年。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通过提高资本的产出效率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对于就业创造和经济转型的重要性。命题 3 归纳了经济增长对转型的上述影响。

命题 3 较快的经济增长能够弥补转型中初始条件的不足。转型中企业的重构也是渐进的，并且经济增长是决定改革（或企业重构）速度的一个重要因素。

初始条件被认为是影响转型的重要因素（参见哈勒根、张军，1996；1999）。而命题 3 则告诉我们，转型的成功并不是由初始条件所惟一决定的，经济增长对转型的成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这正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在发展中求改革”。联系到将激进改革中的增长速度归因于改革速度的观点（如哈勒根、张军，1999；Falcetti *et al.* 2000），命题 3 则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渐进改革中经济增长与转型速度之间的相互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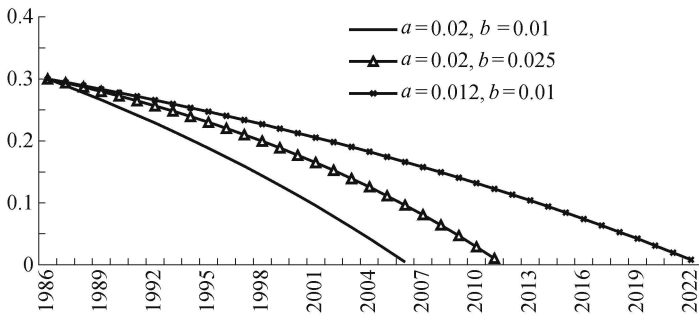


图 2 隐性失业的模拟

(二) 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与企业效率

在本文模型中，政府控制下的国有企业隐性失业的排放决定了国有部门重构的速度，由此而形成的转型路径在本文模型中是内生决定的。而转型中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则可以由隐性征税力度 τ 的取值得出， τ 值越接近于 0，转型结束时国有部门在所有制结构中的份额就会越小。³⁵现实中 τ 值应当是介于

³⁴ 我们假定中国转型的初始状态满足条件 $S_{I_f}(0) \leq a/(a+b)$ 。

³⁵ 本文中的所有制结构调整均指就业的所有制结构调整。

0 到 1 之间，并且也不是既定不变的。³⁶

我们认为中国经济转型的路径可以由前述 3、4 两种情形所描述。进一步而言，首先转型中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会有一个均衡，即当隐性失业排放完毕之后所有制结构将趋于稳定。³⁷其次，给定 τ 的取值路径，所有制结构调整的速度和最终达到的均衡水平就由模型所内生决定。所有制结构的均衡值首先取决于经济转型的初始状态，当转型之初国有经济的资本存量（或有效率就业量）规模较大时，均衡的所有制结构中中国经济就会占较大份额。此外，所有制结构的调整还同模型参数 a 、 b 的大小有关。当隐性失业的利润侵蚀主要由国有部门承担时，企业盈利能力的下降（ a 变小）或隐性失业对利润侵蚀的加剧（ b 增加）都会降低国有部门在所有制结构中的份额。

图 3 是对所有制结构调整的模拟结果，我们将非国有部门的初始有效率就业量设定为 0.35³⁸，图中所有制结构的调整表现为国有部门比重的加速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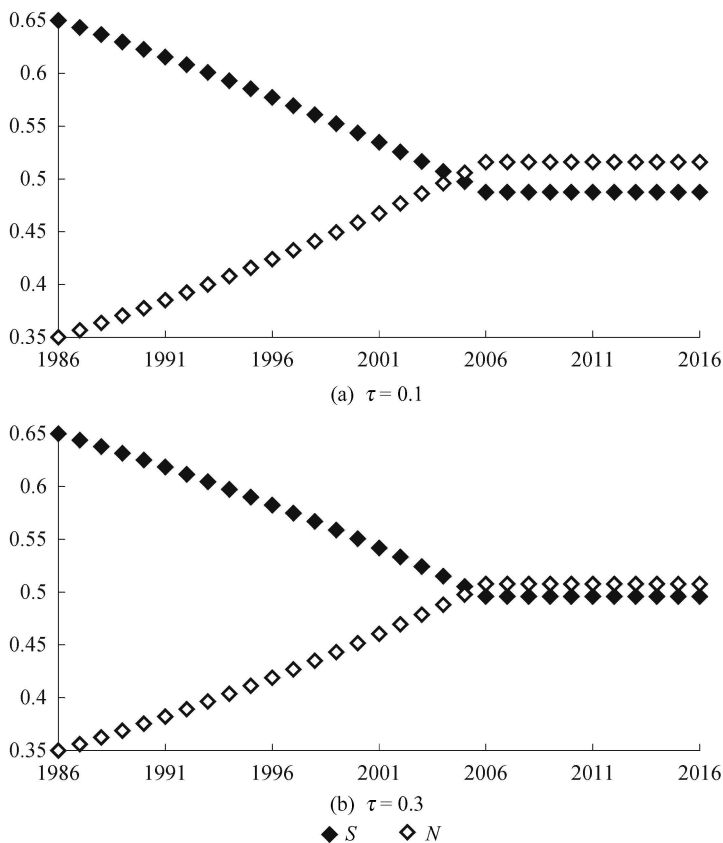


图 3 所有制结构调整的模拟 ($S_D(0) = 0.3$, $N(0) = 0.35$, $a = 0.02$, $b = 0.01$)

³⁶ 本文中 τ 只是一个外生变量，对其进一步的分析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但我们认为现实中隐性失业造成的负担更多的是由国有企业所承担的，因而 τ 值小于 0.5。

³⁷ 我们不排除其他促使所有制结构变化的可能，但这已超出本文所要研究的范围。

³⁸ 1986 年非国有经济的产值份额与职工份额分别为 37.72% 和 31.59%，因此这样的设定是合理的。

以及非国有部门比重的加速上升,随着转型的结束,隐性失业完全被排放,所有制结构就达到一个均衡值,图中 S 与 N 的图像成为两条水平线。

对比图 3(a) 与图 3(b) 不难发现,较低的 τ 值($\tau=0.1$)使隐性失业对企业的负担只有很小的一部分转嫁给了非国有部门,国有部门的就业创造速度相对更慢,与右图($\tau=0.3$)相比,左图中变量 S 的下降较快且最后稳定在位置更低的水平线上,即均衡的所有制结构中国有部门的比重较低。值得注意的是,与参数 a 、 b 不同, τ 值的变化只会影响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对隐性失业路径及转型期的长短均不发生作用。

最后我们来考察一下转型中国有企业效率的变化。虽然本文模型并没有将所有制本身视作导致企业效率差异的原因,但国有企业确实由于冗员的负担而表现为较低的产出效率(这里是较低的人均产出水平)。如果转型能够成功,那么伴随着隐性失业的排放,国有企业的有效率就业量将逐渐增加,其产出效率最终将会提高。³⁹

我们以命题 4 综合上述分析。

命题 4 在成功的渐进式转型中,国有企业的效率最终得以提高,同时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也将收敛于某个内生的均衡水平。

命题 4 隐含着这样一个结论:由于国有企业的效率提高依赖于就业创造对冗员的吸纳,因此在中国的渐进转型中,国有与非国有部门之间就不只是简单的相互竞争的关系,恰恰是非国有部门的发展为国有部门的重构创造了条件。这也正是樊纲(2000)所表达的一个重要观点。

六、结论与含义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经济的转型刚刚吸引人们注意力的时候,主流的经济理论——一个缺乏动态特征、不太关心制度变迁的理论——的确没有给制度的连续而渐进的改革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有人甚至断言没有任何的理论可以支持渐进改革的方案和政策。然而随着激进式改革在俄罗斯、东欧等国导致的产出的严重下滑,各种支持渐进式改革的理论开始受到关注。Murrell(1992)将以 Nelson 和 Winter(1982)为代表的演进的经济学和以 Popper(1957)为代表的保守的政治哲学作为支持渐进式改革的两大理论基础,这两种理论都认为人类的知识有局限性,而转型经济学中关于最优转型路径的研究则进一步说明,即使不考虑人类知识的局限,从理性出发我们仍然可以为

³⁹ 我们也不能排除当隐性失业的利润侵蚀较为严重或 τ 值较小时,隐性失业的排放速度就会相当缓慢,国有企业的有效率就业可能萎缩甚至其速度暂时地快于隐性失业的排放,那么我们将观察到国有企业的人均产出水平将暂时地有所下降。

渐进的改革方式找到理论基础。

不同于俄罗斯、东欧国家的转型事实和经验，中国的经济转型是在产权改革严重滞后的条件下发生的，从转型时期政府放松对国有企业冗员排放的管制这样一个独特的微观基础出发，本文通过一个动态模型考察了中国最优转型路径下的转型速度、企业重构及其对所有制结构调整的含义。我们发现，当政府同时关注产出增长与社会稳定这两大目标时，最优的转型路径必然是渐进式的，并且初始状态对转型的成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即转型本身体现了一种“路径依赖”。在通向成功的渐进转型中，企业的重构表现为依靠社会的就业创造使国有企业的冗员逐渐得以排放，企业的效率也最终能够提高。由于冗员的成本更多地由国有企业所承担，转型中国有企业的份额会趋于下降，但最终又收敛于模型内生的所有制结构均衡。

本文模型还得出了解进改革中经济增长决定转型速度的命题，这隐含着提高企业产出效率以及加入 WTO 吸引外资这类能够加速资本积累的措施对于成功转型的重要意义。此外，本文模型还说明了非国有部门的发展对国有企业重构的积极意义。这些结论共同说明了一个观点，我们不仅要“在改革中求发展”，而且要“在发展中求改革”。

最后，必须指出本文存在的一些不足。本文强调了被现有研究所忽视的所有制本身之外的影响企业效率的因素，没有考虑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内部有效率就业之间的效率差异。也就是说，本文与现有的那些考虑所有制效率差异的文献的基本判断是不同的，但是，本文研究绝不是对这些文献的替代，而是一种互补。虽然这样的处理使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看到国有企业随就业吸纳后社会负担减轻而进行重构的动态过程，但难以回答何时才是开始产权改革的最佳时机这样的问题。⁴⁰因此，一个可行的模型扩展是将产权改革的作用也考虑在内。

此外，为了模型处理上的方便，本文抽象掉了劳动力的异质性，因而忽略了现实中由于国有企业中的隐性失业人员往往属于低素质劳动力，难以被社会的就业创造所吸纳的问题。本文模型还隐含着认为完全由国有企业通过吸纳冗员来降低显性失业率上升所造成的社会成本，这就忽略了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建立可能起到的降低失业的社会成本的作用。如果在今后的研究中能够将上述两方面因素考虑在内，那么现实中社会显性失业率向自然失业率回归的现象就能够在本文分析框架内得到很好地解释。最后，本文也没有考虑工资变化等因素对国有企业内部冗员界定的影响，随着改革中的工资水平的上涨，冗员的数量就有可能相对增多（董晓媛和 Putterman，2002）。

⁴⁰ 田国强（2001）曾通过一个最优所有权安排的理论对此作了说明。

附录 动态最优问题的解

现值汉密尔顿函数的拉格朗日函数：

$$H = L_E - \frac{1}{2}(1 - L_E - S_D)^2 + \lambda(aL_E - bS_D) + \alpha(1 - L_E - S_D).$$

最大值原理要求：

$$\frac{\partial H}{\partial S_D} = 1 - L_E - S_D - \lambda b - \alpha \leq 0, \quad S_D \cdot \frac{\partial H}{\partial S_D} = 0;$$

$$\frac{\partial H}{\partial \theta} = 1 - L_E - S_D \geq 0, \quad \theta \geq 0, \quad \theta \cdot \frac{\partial H}{\partial \theta} = 0.$$

$$\dot{L}_E = \frac{\partial H}{\partial \lambda}.$$

$$\dot{\lambda} = -\frac{\partial H}{\partial L_E} + r\lambda.$$

在这个最大化问题中，我们有 $\frac{\partial^2 H}{\partial S_D^2} = -1 < 0$ ，因而二阶条件得到满足。我们可以将此问题的解分为四种情况进行讨论。

$$(1) 1 - L_E - S_D - \lambda b - \alpha = 0, \quad S_D > 0;$$

$$1 - L_E - S_D > 0, \quad \theta = 0;$$

$$\dot{L}_E = aL_E - bS_D,$$

$$\dot{\lambda} = L_E + S_D - 2 - \lambda a + r\lambda + \theta,$$

由此可解得 S_D 的动态方程：

$$\dot{S}_D = (r - a)S_D - (2a + b - r)L_E + a + 2b - r.$$

$$(2) 1 - L_E - S_D - \lambda b - \alpha < 0, \quad S_D = 0;$$

$$1 - L_E - S_D > 0, \quad \theta = 0,$$

$$\dot{L}_E = aL_E - bS_D,$$

$$\dot{\lambda} = L_E + S_D - 2 - \lambda a + r\lambda + \theta,$$

解得：

$$S_D = 0,$$

$$1 - L_E > 0,$$

$$\dot{L}_E = aL_E.$$

这里约束条件 $S_D \geq 0$ 起作用。每增加一单位隐性失业对政府效用水平的边际贡献始终为负，这样，政府的最优决策是让国有企业将冗员全部释放，利润全部被用于创造新的就业。事实上，这种情况表示经济重构最终已经成功结束。

$$(3) 1 - L_E - S_D - \lambda b - \alpha = 0, \quad S_D > 0;$$

$$1 - L_E - S_D = 0, \theta > 0,$$

$$\dot{L}_E = aL_E - bS_D,$$

$$\dot{\lambda} = L_E + S_D - 2 - \lambda a + r\lambda + \theta.$$

解得：

$$L_E + S_D = 1,$$

$$\dot{L}_E = (a + b)L_E - b,$$

$$\dot{S}_D = -\dot{L}_E.$$

此时，社会显性失业率为零，劳动力人口规模成为约束，在我们给定的就业创造机制之下，如果就业创造为正，那么新增的有效率就业全部来自于对国有企业隐性失业的吸纳，如果就业创造为负，那么这部分减少的有效率就业就全部成为国有企业新增的隐性失业。

$$(4) 1 - L_E - S_D - \lambda b - \theta < 0, S_D = 0,$$

$$1 - L_E - S_D = 0, \theta > 0.$$

此时我们有： $L_E = 1, S_D = 0$ 。这是经济重构成功结束的一种可能结果，隐性失业对政府效用的边际贡献为负，与第二类解所不同的是，这里在隐性失业释放完毕的同时社会有效率就业量也刚好达到 1。

参 考 文 献

- [1] Aghion, Philippe, "Economic Reform in Eastern Europe: Can Theory Help?"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3, 37, 525—532.
- [2] Aghion, Philippe, and Olivier J. Blanchard, "On the Speed of Transition in Central Europe", *Analytics of Transition*, 1994, 15, 1—48.
- [3] Aghion, Philippe, Olivier J. Blanchard and W. Carlin, "The Economics of Enterprise Restructuring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1994, 1058, 1—34.
- [4] Barberis, Nicholas, M. Boycko, A. Shleifer and N. Tsukanova, "How Does Privatization Work?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Shop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6, 104, 764—790.
- [5] Belka, Marek, Saul Estrin, Mark Schaffer and I. Singh, "Enterprise Adjustment in Poland: Evidence from a Survey of 200 Private, Privatized and State-Owner Firms", *CEPR Discussion Paper*, 1995, 1233 (London: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 [6] Burda, M., "Unemployment, Labour Markets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Eastern Europe", *Economic Policy*, 1993, 16—17: 102—128, 132—137.
- [7] Carlin, Wendy, John Van Reenen and Toby Wolfe, "Enterprise Restructuring in Early Transition: The Case Study Evidence from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1995, 3, 427—458.
- [8] Castanheira, Micael and Gérard Roland, "The Optimal Speed of Transition: A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2000, 41, 219—239.

- [9] Chadha, Bankim and Fabrizio Coricelli, "Fiscal Constraints and the Speed of Transitio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7, 52, 221—249.
- [10] 董晓媛和 Putterman, "中国国有工业企业劳动力冗员问题研究", 《经济学(季刊)》, 2002年第1卷第2期, 第397—418页。
- [11] Dewatripont, Mathias and Gérard Roland, "Economic Reform and Dynamic Political Constraint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92a, 59, 703—730.
- [12] Dewatripont, Mathias and Gérard Roland, "The Virtues of Gradualism and Legitimacy in the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Economic Journal*, 1992b, 102, 291—300.
- [13] Dyck, Alexander, "Privatization in Eastern Germany: Management Selection and Economic Transi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7, 87, 565—597.
- [14] Estrin, Saul, Alan Gelb, and Inderjit Singh, "Shock and Adjustment by Firms in Transi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995, 21, 131—153.
- [15] Falchetti, Elisabetta, Martin Raiser and Peter Sanfey, "Defying the Odds: Initial Conditions, Reforms and Growth in the First Decade of Transition", *EBRD working paper*, 2000, 55, London: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 [16] 樊纲, "论体制转轨的动态过程——非国有部门的成长与国有部门的改革", 《经济研究》, 2000年第1期, 第11—21页。
- [17] Fischer, Stanley, and Alan Gelb, "The Process of Socialis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1, 5, 91—105.
- [18] 符钢战, 《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的经济分析——从微观到宏观》。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年。
- [19] Green, Edward J., "Privatization, the Entrepreneurial Sector, and Growth in Post-Comecon Economie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993, 17, 407—417.
- [20] 哈勒根、张军, "改革起点与改革路径: 一个可行的模拟", 《经济研究》, 1996年第1期, 第3—10页。
- [21] 哈勒根、张军, "转轨国家的初始条件、改革速度与经济增长", 《经济研究》, 1999年第10期, 第69—74页。
- [22] Haddad, L., "On the Rational Sequencing of Enterprise Reform", *The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 1995, 11, 91—109.
- [23] Katz, Barbara G., and Joel Owen, "Privatization: Choosing the Optimal Time Path",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993, 17, 715—736.
- [24] 李莹, "国有商业银行竞争力比较", 《金融研究》, 2000年第9期, 第67—75页。
- [25] 林毅夫、蔡昉、李周, 《中国的奇迹: 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年。
- [26] Lin, Justin Yifu, Fang Cai, and Zhou Li, "Policy Burdens, Accountability,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9, 89, 426—431.
- [27] Lipton, David and Jeffrey Sachs, "Creating a Market Economy in Eastern Europe: The Case of Poland",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990, 1, 75—133.
- [28] 陆铭, "为何改革没有提高国有企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 《经济学(季刊)》, 2003年第2卷第4期。
- [29] McMillan, J. and B. Naughton, "How to Reform a Planned Economy: Lessons from China",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1992, 8, 130—143.

- [30] Murrell, Peter, " Evolution on Economics and in the Economic Reform of the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 ", in Christopher Clague and Gordon C. Rausser(eds), *The Emergence of Market Economies in Eastern Europe* , Oxford : Blackwell , Chapter 3 , 1992.
- [31] Nelson , R. and S. Winter , *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 , Cambridge ,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82.
- [32] Newbery , D. , " Reform in Hungary : Sequencing and Privatization " ,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 1991 , 35 , 571—581.
- [33] 平新乔 , " 论国有经济比重的内生决定 " , 《经济研究》 , 2000 年第 7 期 , 第 16—23 页。
- [34] Popper , Karl R. ,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 London :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imited , 1957. (中译本 : 波普 , 《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 杜汝楫、邱仁宗译。北京 : 华夏出版社 , 1987 年。)
- [35] 钱颖一 , " 中国的公司治理结构改革和融资改革 " , 载青木昌彦、钱颖一(主编) , 《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 : 内部人控制和银行的作用》。北京 : 中国经济出版社 , 1995 年。
- [36] Roland , Gérard , *Transition and Economics* , Cambridge : MIT Press , 2000. (中译本 : 热若尔·罗兰 , 《转型与经济学》 , 张帆、潘佐红译。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02 年。)
- [37] Sacco , Pier L. and Carlo Scarpa , " Critical Mass Effect and Restructuring in the Transition toward a Market Economy " ,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 2000 , 44 , 587—608.
- [38] Shleifer , A. and R. W. Vishny , " Politicians and Firms " ,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 1994 , 439 , 995—1025.
- [39] 田国强 , " 一个关于转型经济中最优所有权安排的理论 " , 《经济学(季刊)》 , 2001 年第 1 卷第 1 期 , 第 45—82 页。
- [40] 王诚 , " 中国就业转型 : 从隐蔽失业、就业不足到效率型就业 " , 《经济研究》 , 1996 年第 5 期 , 第 38—46 页。
- [41] Woo , W , " The Art of Reforming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 : Comparing China , Poland and Russia " ,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 1994 , 3 , 276—308.
- [42] 袁志刚、陆铭 , 《隐性失业论》。上海 : 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 , 1998 年。
- [43] 张春霖 , " 国有企业改革与国家融资 " , 《经济研究》 , 1997 年第 4 期 , 第 3—14 页。
- [44] 张军 , 《“双轨制”经济学 : 中国的经济改革(1978—1992)》。上海 : 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97 年。
- [45] 张维迎 , " 公有制经济中的委托人—代理人关系 : 理论分析和政策含义 " , 《经济研究》 , 1994 年第 4 期 , 第 10—20 页。
- [46]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 , " 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 " , 《经济研究》 , 1999 年第 3 期 , 第 16—25 页。
- [47] 祝均一、袁志刚 , 《上海就业报告》。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01 年。

The Optimal Path of Deregulation and Enterprise Restructuring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ZHAO CHEN
(*Fud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builds a theoretical model to study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optimal transition path and speed in China. SOE restructuring has also been investigated in the dynamic model. Different from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enterprise restructuring in this paper does not result from massive privatization, but from deregulation on SOEs.

JEL Classification E24, L16, P21